

# 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

##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走向

□ 胡金焱



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转型期、节点期，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即由“为发展而增长”取代“为增长而增长”。

的、破坏性的、污染性的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支撑增长的道路不能持续下去，必须终结。

我们现在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要在这个阶段把速度降下来，把结构调整好，把消极因素消灭掉，这是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必须经过的。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增速从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不仅正常，而且必须。

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转型期、节点期，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即由“为发展而增长”取代“为增长而增长”。用新的发展方式取代过去尽管正确但不可维系的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完成，一是经济结构优化，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二是发展方式转变，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发展动力转换，从依靠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新的供给的要素来拉动经济新的增

长，支撑未来中国发展。

现在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信息化产业发展波澜壮阔、十分迅速，只要搭上这个快车，利用好“互联网+”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就能够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就能够推进中国产业走到全世界的前列。但发展方式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对中国当下来讲，就是要形成全民的意志和全社会的共识进行。因此，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要占领未来产业的制高点，培养为未来产业接招的人才，形成新鲜的产业，就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就需要营造全民创业创新的浓厚氛围，从而使一部分人从中脱颖而出，成为未来发展的支撑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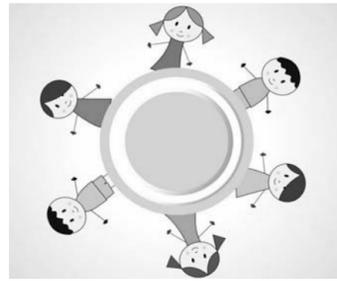
为了配合经济产业转型和结构升级，我们迎来了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创新突破期”。在过去，存在中央集权管制、官办金融、一条线监管、管制利率等情况，导致金融的市场化程度低、计划性强、垄断性强，金融改革滞后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现在中国金融面

临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从官办金融到民办金融、从正规金融到非正规金融、从垄断到开放、从地下到地上、从线下到线上、从全国到区域、从单一到多层次、从纵向到横向、从条条到块块等多个变化。目前利率市场化已经完成，汇率形成机制正在完善，人民币逐步实现国际化，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正在建立，以及民间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深化金融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金融的供给侧改革是为国家改革战略实施提供支撑的。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全社会蓬勃开展，在推动新产业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多元化建立从大到小、从宏到微的金融组织体系；需要建立可以实现直接和间接融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样才能真正为未来新产业的形成、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新的融资平台、寻找新的机会。国家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目的是通过市场的建设、多层次的发展、资本市场的活跃，调动社会的各类资源，把各种资源聚集起来，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推动新的市场办起来，服务于国家战略。当然在市场建立过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中等收入陷阱下的金融脆弱性，体制内金融风险，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间巨大不平衡，区域金融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问题正在聚集，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从中长期分析，伴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中国地位在全球上升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从全球经济整个态势来看，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尤其欧债危机影响将趋于长期化，全球经济总体不振将持续。金融危机严重损耗了发达经济体的力量，欧债危机一波三折地冲击欧洲和美国；日本根本还未从上一次衰退中走出来；包括金砖国家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下滑，全球经济可能进入至少十年以上的低速增长甚至衰退。而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迎来了全球化时代，区域合作进程全面展开。1996-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区域合作发展迅猛，“10+1”、“10+3”、“13+5”（东亚峰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经贸合作机制相继启动。东亚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的趋势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世界重心逐步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的力量收缩，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下滑，也加剧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未来10年，中国可能还是唯一有望保持相对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只要我们走出为增长而发展的阶段，进入为发展而增长的阶段，利用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战略，从未来中长期来讲，中国地位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副校长)



## 别让朋友圈成为负累

□ 伊一芳

信息泛滥、网络谣言、心灵鸡汤、帮忙点赞、拉粉投票……微信朋友圈中有着太多的“不必要”。这些个“不必要”，让朋友圈如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在微信朋友圈几乎就是整个交际圈的今天，发消息、等消息、回消息成为我们的日常。然而，不断被投票、代购、广告信息刷屏，也让一些年轻人选择了关闭朋友圈。近日，有媒体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调查显示，35.8%的受访者想关闭朋友圈，其中19.7%的受访者正打算关闭朋友圈，13.8%的受访者曾经关闭过朋友圈，2.4%的受访者已经关闭朋友圈。

微信作为使用人数最多、活跃度最高的新兴移动即时通信工具，其“朋友圈”是朋友之间亲密交流、互动互动的阵地，兼具“大喇叭”的效应，能迅速产生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效果。特别是“朋友圈”最大的特点在于分享，既可以分享各自的心情和生活状态，也可以分享各种信息、文字及对生活的看法和见解等，当然，还可以相互点赞。这种精神层面的沟通，使现实生活得到了延伸，也大大丰富了信息量，拓展了我们的眼界。在微信“朋友圈”这个半私密的空间里，大家既可以展示自己，也能够感知他人；既可以发表见解，也可以交流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朋友圈”是互联网时代带给我们的一种“精神红利”。

然而，“朋友圈”里部分用户不假思索随手的社交心理习惯，导致了信息泛滥，除了看得太多让人感觉腻味的各种心灵鸡汤以及各种带有威胁、诅咒语气的“不转就不是中国人”之类的网络谣言之外，各种各样的晒幸福、秀恩爱以及没完没了的商品推销，更是对人忍耐力的一种巨大考验。

更让人烦不胜烦的是，朋友圈中那些指名道姓要求你帮助对方参与网络投票的，帮助自己的领导上司点赞的，甚至作为工作任务必须帮单位微信公众号拉多少个粉丝的，你既不可能视而不见，还囿于情面或压力而不得不小心应对。结果就是我们连对方参加的是什么活动都不知道，就帮对方投票；明明对领导有意见和不满，也不得不违心点赞。除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纠结之外，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就不自觉浪费了。对此，不少人无奈地表示，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种负累，让自己心烦意乱。尼采说过：“我之所以这么聪明，是因为我从来不在不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微信“朋友圈”中有着太多的“不必要”，这些个“不必要”，如鸡肋一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35.8%的受访者想关闭朋友圈，即印证了这一事实。

微信“朋友圈”如一面镜子，既照见自己，也照见了社会生活。而如今的微信“朋友圈”成为一种负累，不仅仅是微信的悲哀，也是“网络中人”的悲哀。别让微信“朋友圈”成为负累，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自觉净化好“朋友圈”，认真经营好“朋友圈”，真正涵养好“朋友圈”。有人说，“朋友圈”就是自己的花园，“我的花园我做主”，别人可以选择不看。其实不然，正因为朋友圈是私人圈子，都是自己最在乎的与自己最在乎的人，所以更应该意识到自己每发布一条信息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作为朋友圈这个花园的主人，我们都应该具有公德心和自律性，都有义务对待朋友圈的内容，在面对一些谣言传闻、养生秘方、算命占卜时能够认真进行甄别，规范发言，自觉做到不传谣、不信谣，不让亲友上当，不绑架亲友爱。

同时，我们还应利用微信“朋友圈”涵养自己的心灵。混圈子这件事，一百个人，有一百种说法。一位网友说：“圈子文化有好有坏，但是无论如何，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圈子。”如何让自己的朋友圈像阳光一样运行，让朋友圈里的众人共享正能量，需要我们从现实生活出发，利用微信“朋友圈”涵养心灵，修身立德。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发一些对工作、学习、生活有实际益处的感悟和经验，而不是一味地抱怨生活，埋怨他人，传递负能量，这样的微信“朋友圈”才会更有涵养和品位，充满正能量；这样的微信“朋友圈”才能回归“初心”，回归“朋友”的本质，多一些温情与暖意。否则，混乱无序、变了味道的微信“朋友圈”，最终恐怕只能面临被所有人抛弃的命运。

企业化管理”的研究体制，建设一个有效率、有独到观点的咨询研究机构，形成独立社会化的管理体制，能够更公正、客观地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撑。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强化对决策者的责任机制。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难以落实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决策者缺乏有效的法规监督和问责制约。决策者权力凌驾于科学民主和法制之上，实际上在决策中形成了“一切皆由我拍板”的现状。近年来，党和国家对规范权力运行、强化监督也出台了多项规定和规定，但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决策”仍处在“空转”、“短路”状态。一些重大项目、重大决策大多是领导拍板，再走程序，形成了“开大会解决小问题，开小会解决大问题，不开会解决关键问题”的潜规则。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目前一些地方重大决策报告还存在突出问题。一是以事后调查报告取代事前咨询报告。对事前科学民主决策过程缺乏制度性约束，往往是出了问题再找人追究问责。二是报告的形式多于内容。很多报告主要依靠秘书班子，大多描述决策事项进展情况以及取得了多少成效，而较少深刻涉及决策有多少风险，需要破解的风险瓶颈，需要哪些可行性研究等。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不断完善评价机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智库评价决不能只看领导批示，不看实际成效，要建立一套客观、公正、系统地智库科学评价模式。对智库评价，首先要明确智库评价目标；其次要构建一个评价反映智库目标和智库运行的关联指标体系；第三是能够客观真实采集到系统运转的现实指征。三者合一，才能形成科学的智库评价机制。因此，对智库考核评价机制，不应简单地看智库机构拥有人员、设备规模等，也不独取批示件有多少，而要看其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率、社会影响力、同行竞争力等，并形成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延后考察、多维评价、系统判断，构建多元化智库研究成果评价机制。同时，坚持定量与定性、即时与延时、专业与社会兼顾等原则，充分发挥智库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作者系青岛社科院科技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

## 智库如何真正成为“外脑”

□ 隋映辉

难”的问题；在政府信息获得、人才引进、职称评定、政府购买服务、税收优惠等多方面，智库亟待改革的体制机制问题较多。尤其社会智库难以享受与体制内智库一视同仁的政策及参与建言立论的渠道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四是经费普遍不足。官方智库经费一般来源于财政拨款，研究课题由政府相关部门立项等，研究成果往往容易受其所委托的部门利益和部门领导意志所左右。而可以实施客观研究的社会智库普遍缺乏支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有关资料显示，一些研究机构，其经费来源来自主管单位的资金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美国智库发展经费则主要来自政府委托课题资助和社会捐赠；德国智库发展80%以上依靠政府全额资助。而我国多数智库经费除了人头费、一般活动经费，用于科研的实际经费的比例偏低。

新型智库建设与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只有将智库建设纳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构建充满活力、科学有效的决策体制机制，才能打破惯性、突破瓶颈，克服滞后发展路径依赖，全面解决智库建设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秉持“学科交叉、行业跨界、个性混搭、多元协调”理念，摒弃“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官本位”思维。借助智库创新示范平台，充分发挥人才体制机制作用，促进智库要素优势互补，组织跨部门、跨部门、跨学科研究，形成纵横一体、链接聚合体系。为此，要加快智库体制改革，跳出独门大院的“一亩三分地”，构建链接发展机制、畅通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激励评价机制、健全协同研究机制。通过健全资源融通、系统创新的机制，不断释放智库的制度创新优势，让新型智库在决策咨询及社会实践中得到最大的能量发挥。

推进新型智库建设，要强化“谋断分设”的制衡机制。设立相对独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公共决策研究评估机构，提供客观公正的决策参考。政府要营造智库机构间公平竞争的氛围，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智库必须通过项目获得经费，项目获得必须公平、公开、公正竞争。评判标准应是否为能够提供更有效、更可行的方案，是否能对政府和社会带来更大的帮助。积极推进“官方背景、民间机构、事业法人、

目前，与国外智库比较，我国智库建设还处于发展阶段，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法规制度不健全、外部环境不完善、发展定位不准确、机构设置不合理、“官本位”现象严重、社会影响力有限、包容开放程度不够等。一些政府提出的咨询需求，眼前多、长远少；部门多、全局少；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导致智库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急功近利，多以中短期发展问题为主。智库主要充当政策决策的“诠释者”，无法担当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的“建设者”和“推动者”，智库建设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极不相称：

一是体制机制不健全。新型智库建设主要依托领导重视及行政性推动。这样的决策咨询体制现状，充分反映了智库制度建设是通过部门参与各级政府文件的制定，但往往难以把建言献策落到实处。而不能落到实处的原因是，智库参与决策咨询的制度定位及作用还不健全。缺乏多元化、多渠道建言献策的路径和成果推介的公共服务平台。因有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咨询研究成果难以直接送至党政决策核心，不能发挥其参与决策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应有作用。

二是“官本位”现象严重。我国现有智库大部分是隶属政府的事业单位，存在着机关化、行政化等问题。一些智库组织松散、创新意识淡薄、竞争活力不强等问题比较突出。咨询研究盯着上头、忽视一线，联系实际、挖掘短板不够，难以由政府及社会提供不同形式、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产品。由于经费多是依靠主管部门获取委托课题的资助，托课题表面上以招标形式进行，但在申报中却以各种限制条件将有竞争者排除在外；或者即便给予竞争资格，在评审中也存在诸多暗箱操作问题。这些现象，既不利于智库的整体建设发展，也不利于催生富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是人才政策弱化。新型智库是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领域。但智库建设缺少对研究人员的激励机制和咨询效果评估，年度考核以领导批示、论文数量为本，因而疲于应付，少有深刻洞见的思想和独到见解。由于缺少跨界、跨域、跨学科的合作研究，研究人员缺乏适度的竞争性、流动性，包容开放程度不高，一些智库面临“引进人才难、留住人才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呈现出两大变化特征。一是全球经济在波动中走暖。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次危机几乎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没有预测到，使全球经济在毫无准备中陷入了严重困境；2009年是全球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在全球救市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自2011年之后再次进入低谷。自2013年以后，特别是2014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在波动中复苏的态势，尤其美国经济的复苏更具代表性。二是中国经济持续性下行。2003年至2007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周期，可以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是过“热”的。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看出，2007年底“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2008年4月“既要防经济过热，又要防经济下滑”，7月“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再到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表明中国经济遭受了巨大冲击和挑战。2008年，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务院提出了4万亿财政投入和十大扩内需政策，在极短时间内阻止了中国经济的下滑，保证了中国经济短时间内企稳回升，成为全球当时唯一短期走出危机的经济体，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特点。然而到了2011年之后，在这一轮由欧债危机和美债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下滑过程中，中国经济掉头向下，甚至在2013年全球经济出现复苏后，仍然往下走，呈现了持续性下行的阶段特点。

中国经济下滑不能从表面上理解，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认为，可以把中国经济的下行称为“积极有为”的下行。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从经济社会现实看，大量的问题都不比“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小，对外面临出口需求不足，对内面临经济结构调整、行业产能过剩、生态环境恶化、宏观债务水平上升、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等问题，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换挡。另一方面，从根本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必须走出为增长而增长的阶段，走向为发展而增长的新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走了一条为追求GDP增长的“发展”之路，即立足于“投资+消费+出口”需求管理的“需求侧改革”，在追求GDP的大背景下，“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样一个为增长而增长，由一个个短期增长组成所谓的“发展”过程，也使我们承受了“发展”的代价。这种依靠低端

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转型期、节点期，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即由“为发展而增长”取代“为增长而增长”。用新的发展方式取代过去尽管正确但不可维系的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完成，一是经济结构优化，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二是发展方式转变，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发展动力转换，从依靠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新的供给的要素来拉动经济新的增

我们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新的转型期、节点期，从需求侧改革到供给侧改革，即由“为发展而增长”取代“为增长而增长”。用新的发展方式取代过去尽管正确但不可维系的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以下三方面完成，一是经济结构优化，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二是发展方式转变，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三是发展动力转换，从依靠投资拉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供给侧改革就是通过结构调整、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新的供给的要素来拉动经济新的增

智库要真正发挥“外脑”作用，就不能只做政策决策的“诠释者”，而应积极建言献策，成为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近年来，党和国家对“智库建设”给予高度重视。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养成问计于专家学者的习惯，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用好、活用智力资源。对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的要积极采纳。事实上，决策科学化与新型智库建设已经上升到党和国家战略的高度。

目前我国一些政府机构、高校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智库的职能，但实际上离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标准还相去甚远。一些智库机构的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现象较为严重。一些机构名为智库，实则类同秘书班子，建言献策作用不尽如人意。这些机构并不具备新型智库要求的客观性、前瞻性、专业性、影响力等特点。有研究表明，中国决策失误率达30%以上，原因主要就是决策体制机制不合理。由于决策尚未实现“谋断分设”，还在由个人或少数人拍板向民主决策、由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由谋断一体决策向谋断分离决策、由分散决策向系统决策转变，多数咨询研究机构还属于依附型，因此目前很多智库的作用只是解释决策正确，做出常态性的归纳总结，而难以发表独到见解与建议，无法发挥作为新型智库提供真知灼见、建言献策的作用。

因为没有完善的法规制度作保障，决策论证评估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场”，对各方面的建议吸纳并不充分。一些地方出台重大决策前，决策者既可以咨询也可以不咨询，即便咨询有时候也是走形式、走过场。征求意见往往是为了证明其决策正确，而不是真正要发现什么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一些专家学者在决策中不能真正发挥“外脑”作用，顺溜的话多，建设性意见少。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决策属于“黑箱”决策，对一些涉及城市重大建设项目、有关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还是部门自己说了算。决策制定后一纸公文，公众只能被动接受。这类“黑箱”决策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大，决策往往自以为是、脱离实际，后患无